

■走进现场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创新建设模式

张怡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北部,2022年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为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依托国家级大遗址——安吉古城遗址、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一期规划面积203.74公顷,内设考古现场展示区、考古保护中心、遗址博物馆、生态自然体验区等8个功能区。

20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安吉古城是越国早期城邑,秦汉郡郡与故郡县治所在地,八亩墩等越国贵族墓园是早期越国王(后)陵所在地,其代表的越文化和秦汉郡治文化是浙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16—2019年八亩墩考古发掘,出土大量越国高等级遗迹遗物,被誉为“中国越文化研究的‘百科全书’”,对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社会和专家三方合作 首创考古遗址公园运营模式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创“政府主导+社会投资+专家坐堂”的建设运营模式,开创了古城地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局面。引入浙江绿城公司深度参与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成立由安吉古城遗址公园理事会、浙江大学、浙江大学专家组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专家委员会,全方位指导遗址公园建设运营和考古研学。

2022年,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开展考古研学活动100余场,成功举办“长三角露营大会”“古越文化节”等活动,荣获“全国十佳文化遗产旅游案例”“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浙江省大花园耀明珠”“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浙江省文化和旅游促进共同富裕最佳实践案例”“浙江省公共文化国际交流基地”荣誉称号。



活动现场鸟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念的提出有助于遗址保护和旅游融合,考古遗址公园面向公众,尤其是对青少年,具有传播中华文明的积极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是该公园的设计师,在谈到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运营理念时,他提出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重点应在于教育,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以安吉的特点建设,来告诉公众考古究竟是什么。在未来,还会在遗址空间内逐渐完善更多的内容,把考古、研学体验、文创等功能集合于一体。

风从长安来 春至安吉游

2月28日,“风从长安来——汉景帝和他的

郾郡”展览在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开幕。特展由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和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共同举办,再现了汉景帝时期生活图景,呈现出汉朝中央与地方文化交流的繁荣。同时在今年春天,安吉率先推出文旅融合的新举措,派发20亿文旅消费券,抢抓产业升级和行业复苏机遇。

本次展览通过策马飞舆(车乘)、衡量盛景(量器)、仓廩丰实(生活器具)、汉家风韵(侍从俑)、六畜俱兴(动物俑)、汉室光华(建筑材料)六个特展单元,选取了享誉中外、被称为“东方维纳斯”和“东方大卫”的着衣陶俑。神态怡然、类型多样的各式侍从俑、动物俑,及彩绘陶鼎、铜镜等100余件一、二级文物,让长三角游客近距离体悟汉文化之美。

出土自汉阳陵的陶俑是本次展览的重要文物。皇家工匠以真人形象为蓝本,用艺术的手法



“考古山房”学术沙龙

创作出这些工艺复杂、外形华丽的陶俑。陶俑造型逼真,刻画细腻,比例匀称,五官端正,表情丰富,身份各异,汇聚成一幅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其中着衣彩绘侍女俑身姿优美,巧笑倩兮,成为展览中的“明星”。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一个高峰,据《史记》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景帝自上而下厉行节俭,展览风格也同样质朴无华,在细节中展示出皇家气派。展览中展出汉阳陵考古出土的建筑材料,其中汉阳陵藏白虎纹空心砖属于四神空心砖的一种,四神代表方位之神仙,其中白虎是驱邪食鬼的猛兽,砖石上虎头、虎身、虎足用弯曲度不同的线条勾勒,显得威风凛凛,神圣不可侵犯。展出的出土文字瓦当上,刻有“千秋万岁”“与天无极”“长乐未央”“与天久长”等字样,具有祥瑞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汉阳陵考古陈列馆首任馆长焦南峰认为,墓葬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迈出的第一步。汉景帝阳陵中出土文物体现出的丧葬习俗,反映出古人“事死如生”的生死观。汉阳陵的建设理念受到汉长安城建设布局的影响。

作为安吉文化旅游的重要一站,“风从长安



“风从长安来——汉景帝和他的郾郡”展

来·春至安吉游——20亿安吉文旅消费券派发启动仪式暨汉阳陵文物特展开幕仪式”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行,向长三角及全国游客推介了“春采薇、夏玩水、秋观星、冬滑雪”,全年40多场主题活动,四季精彩不断,兼具绿水青山和人文底蕴的美丽乡村——安吉。

仪式现场,还先后进行了《安吉遗址公园群落建设任务书》签署仪式,《安吉·永远的家》文旅推介情景剧演出,2023中国美丽乡村嘉年华四季活动预告发布,以及20亿安吉文旅消费券上线仪式、汉阳陵文物特展暨2023中国美丽乡村嘉年华启动仪式等多项议程。

活动当天,安吉古城设置有“汉越故事”文化展示、“金川魅力”文旅展示、“艺趣市井”民俗体验、“大雅雅集”文化互动、“汉学礼仪”研学宣教、“安吉考古大讲堂”论坛等多个活动区域,汉越文化共舞,为游人、嘉宾提供蹴鞠、投壶、刺绣、煮茶、茶艺、花灯等精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体验项目。其中,“安吉考古大讲堂”论坛活动,包括探讨“遗址保护和运营利用”的“考古山房”学术沙龙;以《汉景帝的地下王朝》为主题的“安吉考古大讲堂”讲座;良渚博物院主持,浙江各遗址博物馆参与的“浙江省博物馆学会遗址专委会2023年第一次会议”等内容。

(上接2月10日8版)

从西沽和大运河再谈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写在天津设卫得名618周年之际

穆森

大运河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命脉

天津是因水而生,因河而兴的城市。“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交通枢纽。从金、元时起,由于漕运兴盛促进商业繁荣而发展起来。明代在此设卫建城,进一步奠定了古城的基础。”这是国务院公布天津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的介绍。

围绕城与河才能找到天津城市原点。天津名城保护要聚焦于此做文章,不能让宝贵的历史财富变成历史遗留问题。红桥区是天津城与河的重要枢纽,需重点关注。

不能忘,在推动设立“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日”过程中,天津文史耆老杨太辛先生曾给我写下这样的话:“古代天津是退海之地,曾多次发生海侵,因此社会发展滞后。根据考古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津地区已有若干村落,最早的行政建制则为北宋时期金王朝设立的直沽寨,距今八百多年。明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天津设卫筑城。当时筑城选址在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之处,即三岔河口之滨,向东可达海口,有利于海上漕运,从此奠定了天津城市发展之基石。不过回顾历史演变状况,早在天津设卫之前,在今红桥区地带,由于南北运河通航,已是内河漕运的重要码头。无论人口聚落、商贸往来,文化形态,甚至名人效应,均居于领先地位,后来才逐渐转移到海河两岸地区。所以在纪念天津建卫筑城618周年之际,切不可忽略今天津地区带率先形成天津经济发展纽带的历史地位。”

大运河是构建天津名城完整保护体系的核心要素。“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天津,由于对传统城区的破坏,保护格局出现了“重近轻古,重西轻中”的倾向。2010年后,新一轮名城保护规划将老城区、估衣街、古文化街划定历史文化街区,现又新增独乐寺、渔阳鼓楼历史文化街区,亡羊补牢犹未晚。下一步还要把大运河摆到更突出位置,把老城区历史风貌的修复工作摆到更重要位置。红桥区是天津城市发展史,是历史上运河运输的集散地,天津的商业中心,我国近代教育的重镇,是天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存最丰富的区域。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为天津发展提供重大战略机遇。借国家大势,打通运河、海河和渤海湾,充分发挥天津港口优势,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红桥区“三河五岸”的区位优势,是连通大运河沿线和雄安新区水上航线的枢纽,而西沽正处在枢纽的交汇点上。

西沽是天津老城厢、估衣街等历史街区遭到破坏后,中心城区内仅存的,且保存完整的大运河历史聚落。这里有着几百年的运河与城市发展史,有我国近代教育的起源,有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理应是红桥区对外展示大运河文化形象之地。

2013年,天津市政府批复的《天津境内京

杭大运河保护与发展规划》中,西沽作为重点地区纳入保护范围。遗憾的是,西沽依旧被划为棚户区,遭到大破坏。为此,国家文物局专门致函地方政府“要求对其实施整体保护”。更加遗憾的是,西沽依旧被拆得面目全非。风吹过,燕儿何时归?大运河历史积淀岂是一片废墟?

西沽是红桥区大运河工作的短板,红桥区是天津大运河工作的关键,天津是国家大运河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为落实国家大运河战略,天津制定的《天津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天津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中,保护西沽的底线没有退让,困扰西沽保护的主要问题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落实保护也是改革的红利,事关区域发展理念和思路。2021年,十一届天津市委第九轮巡视在红桥区的反馈意见中指出:“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历史文化’重要指示要求不够深,保护传承利用存在差距”等问题。明确要求:“持续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红桥是亲切可爱的,最具生活烟火气。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要这样的底气和优质资源。恕我直言,发展不能“转基因”,红桥区要有老城区思维,谋划符合老城区的科学发展模式,通过大运河保护优化文化教育和生态环境,优化产业布局,让天津人在此寻味乡愁,海内外宾朋在此感受天津。

大学生文创赛新增了大运河与城市文化专项。我在主持评审时发现,涉及红桥元素的作品最全面。在大学生眼中,红桥是天津大运河的代名词,比很多“着力打造”更深入人心。

我们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就会如何反哺我们的发展。区域发展没有统筹兼顾老城区保护和民生改善,才把问题一点点托大,“拆”非但解决不了发展问题,还会新增历史欠账。西沽保护要回到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框架中来,严格落实国家和天津市关于大运河保护的相关政策和规划要求,将整体保护修复西沽与天津大运河博物馆规划建设相统筹。天津名城保护规划应有西沽一席之地,西沽成为天津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地段,不应再是梦。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西沽与估衣街历史文化街区都在红桥区,这两个关键节点事关天津整体工作。红桥区的文物资源太丰富了,如由国内权威专家宿白、谢辰生、徐葆芳、张忠培、黄景略共同认定的我国甲骨文重要辨识地马家店遗址,如今却也在一片废墟中,苦苦等待……我诚挚盼着,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早日“活起来”,赋能区域发展,让红桥这颗大运河畔的璀璨明珠,绽放出迷人光辉!

千言万语,无法割舍对城市的依恋!天津不缺乏文化资源,天津发展的逻辑中历史文化名城不会缺席。增强文化自信,知天津、爱天津、护天津,才能建设好天津,让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完)

■保护工程

文物社会价值的实现与大遗址保护工作的良性互动

——以汉代长沙王陵墓群桃花岭墓地保护为例

马代忠 徐路

汉长沙国是两汉时期重要的诸侯王国之一,根据时间先后可分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存续共计220年。汉代长沙王陵墓群是汉长沙国王室及成员墓,位于与长沙国都城临湘一江之隔的湘西岸的低矮丘陵地区。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与长沙王陵墓群相关的各类遗迹点23处,其中已发掘者5处。墓葬规模普遍较大,皆为一山一墓,上部建有大型封土堆,墓穴凿于山体之中,墓室为带墓道的甲字形或中字形,多使用黄肠题凑葬制,部分还采用了金缕玉衣等汉代高等级丧葬形制(礼仪)。

桃花岭墓园是汉代长沙王陵墓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桃花岭汉墓本体,夯土垣墙一段及13座中小型陪葬墓。其中墓葬本体平面呈甲字形,为带墓道的竖穴岩坑木椁墓,由封土、墓道、墓坑、椁室等部分组成。墓主为西汉中晚期某代长沙王,绝对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18年至公元7年。举世瞩目的双面云纹青玉璧、长沙王印金印等重要文即出土于此。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来,汉代长沙王陵墓群大面积发现,长沙市人民政府决定采取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模式对汉代长沙王陵墓群进行保护性利用,2011年完成市级立项。2013年王陵墓群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即遗址管理处制定了保护总规并于2014年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次年,遗址公园管理处正式成立,作为后续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和责任单位。在建设主体——湖南湘江新区和遗址公园管理处的积极推动下,2019年至2021年先后开展了桃花岭墓园环境整治工程和文旅提升工程,两个项目的顺利竣工标志着遗址公园桃花岭墓园的基本建成,也标志着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桃花岭汉墓群环境变化历程及存在问题

桃花岭汉墓群环境变化历程 桃花岭汉墓位于湘西岸的沿江低矮丘陵台地上,属于长沙中南部丘陵岗地区,地质结构主要以石英砂岩、砂岩、粉砂岩及页岩等为基础,山丘多呈岛状分布,山丘间间隔存在若干地势较低的水塘。桃花岭墓园历史上曾遭到若干次的严重破坏,保留了部分汉代地层。

通过查阅历史地图及卫星影像,发现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区域内原始地形地貌层经历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变迁:

第一次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至20世纪末,桃花岭丘陵周围原山沟谷地以及桃花岭丘陵次峰东坡、南坡山麓部分被当地村民修建住宅所破坏,村民另将丘陵坡表改造为梯田,同时在山麓或缓坡处植树、修路、开挖池塘与引水渠等。这一时期,墓葬本体周边环境仅作为附近居民盖房取土,尚未发生大型机械大面积开挖现象。

第二次约在2000年后,随着城市扩张和大规模城镇化的展开,丘陵东侧坡地山体南侧遭到机械开挖破坏,新建成为水泥搅拌厂,但封土周边的山体依旧被当地居民作为农耕用途。桃花岭丘陵南坡中部被开挖取土整体降低,东部山坡被堆放深约1~5米的建筑垃圾。

第三次为2008年年底古墓葬被发现之后,

墓地范围内东侧原搅拌厂被废弃拆除,随着遗址性质的确定,该处被限制开发,地表开始长满竹林、藤萝、茅草、灌木和乔木等杂乱植被。墓地西侧、北侧成为商品住宅项目建设施工场地。

保护项目实施前所面临的问题 桃花岭汉墓所在山体呈“凹”字形,分主峰和次峰两部分。整体稳定性处于较安全状态,植被覆盖良好。但由于所处区域容易出现强而急的暴雨,还极易出现长期的连阴雨,致使墓葬所在山体南侧和西侧滑坡坍塌表现得较为突出,威胁遗址安全和完整。

主峰封土部分周边的植物以根系发达的杂木、荆棘为主,十分杂乱,缺乏层次感,其余部分被村民改造为梯田用于菜地使用。次峰曾被开发商取土破坏,且倾倒了较厚的建筑垃圾。

从观赏角度观察,山体植物风貌色彩单一,缺乏美感;虽然遗址区南侧山坡视野较为开阔,但北侧视线被高层住宅楼阻挡,同时噪声污染也较为严重。

从保护角度分析,杂木发达的根系和野生竹子的竹鞭对封土安全构成威胁。保护区域内仅有一条路面破损严重的硬化道路,其余多为土路,狭窄且通行能力差,有效消防覆盖范围小。若干环山小路沿山体西侧分布,环绕封土堆一周至山下,杂草植被丛生,坡度较大,宽度极窄,路况复杂,但也需兼顾巡逻使用。

保护理念及措施

保护理念 《长沙国王陵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提出,遗址所在山体及周边区域内因先期建设进行地面开挖的区域,应逐渐恢复原有地貌,实施植被绿化。对规模较大的墓葬群周围应栽种一圈灌木树篱,墓葬本体和周围20米范围内可铺设草地草用草本植物进行绿化标识,以期达到对遗址良好的展示效果。

《汉代长沙王陵墓群谷山片区环境整治工程设计方案》提出,对桃花岭汉墓封土现存盗洞进行回填,保持封土完整性。对封土取土凹陷处进行回填,保持山体完整性。地貌恢复后,依据周边植被环境选取相应植物类型,对覆土回填的部分进行绿化修复。

根据上述规划要求,桃花岭墓地保护措施遵循以下保护设计原则:展现汉墓封土风貌,采用博物馆式的观赏方式呈现出特色的景观体验;坚持保护原有地形地貌,少动土,避免大面积施工;加强原有植被利用,对现有山体植被原貌进行选择性利用和保护;纪念性空间及遗迹的展示应有助于寓教于乐的体验,重视遗址社会价值的实现。

保护措施 针对前述问题及保护理念,将桃花岭汉墓遗址区分为遗址入口区、山体区及山沟谷区三个主体功能区。

遗址入口区主要解决游览、交通集散等功能需求,采用雕塑、符号展现汉长沙国历史故事,引导游客上山游览。

在山体及山沟谷区,尊重原地形地貌植物,优化及利用现有场地条件,营造上山游览步道的代入感,打造优美、植被丰富,季相变化的自然景观环境。清理次峰建筑垃圾,设置汉印步道、观景平台等景观节点,将文化元素融入其

中,形成以长沙国特色文化为主导的空间场所。清除封土堆上生长的乔木、野生竹丛等植物根系。修复破坏的山体,清理梯田,回填盗洞,减少原有山路设置,对植被清理后的封土及山体表面进行生态护面。采用架空栈道进行游览,起到本体保护作用。植被改造凸显季相变化及山体保护功能,力求使封土展示区呈现出特色的景观体验。配套开展水、电、通信等配套基础设施工程。

在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的同时,利用长沙市十三五文旅提升工程竣工验收契机积极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先后开展了把爱带回家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元宵节活动暨“桃花公益苗圃成长”做新时代五星好少年志愿服务活动、“春色万象新 百花竞齐放”郊游踏青活动、“童心向党,献画长沙”青少年实践主题活动、“雷锋号”青少年关爱家园夏令营实践活动、“传承历史精神 弘扬传统文化”文艺汇演活动、青春心向党 共筑中国梦朗诵公益课堂《世界因我而美丽》、“践行新时代文明 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百年星火 映照长沙”为主题的文化遗产宣传实践活动,全面展示了桃花岭组团的文化历史价值,提升了文旅体验,用行动诠释了保护与利用的文物工作主题,为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持续不断的原动力。

效果评估及工作建议

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依托汉代长沙王陵墓群最集中、保存最好的谷山区域建设,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文化。但由于相关遗址使用时间较晚,导致遗址规划、保护、管理工作一度十分滞后,以至于相关职能部门对长沙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不够,这与经济及其他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巨大反差。

令人欣慰的是,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2021年已列入长沙市十四次党代会重点支持的十大民生工程之一,桃花岭组团的建成进一步扩大了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区范围,通过开展诸如文物价值研究、公众考古及其他丰富多彩的社区教育活动,全面展示了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桃花岭墓地保护现状,积极推动汉长沙国遗址逐步融入现代生活,集中体现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新成就、新风貌,促进了公园建设工作,提升了周边环境品质和公共服务质量,成为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载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充分实现了其社会价值。

文物资源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文物事业在政府工作大局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独特作用不断彰显。今后,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还将继续以桃花岭组团建成为依托,继续推动政府决策成立领导小组,加强顶层设计和部门间沟通协调,建立发改、财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等多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合作协同,提高队伍整体素质能力,培育多学科合作创新团队,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让文物“活”起来,让社会教育“火”起来,充分激发考古遗址公园活力。

(作者单位:长沙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